



从警纪念章

□肖方明

这是一枚从警三十周年纪念章。从领取时起,我多次想起它。

5月份一天,我从外借单位回来参加夜巡。我来到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只小红木盒,盖上印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队伍四句话总要求:“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和警徽图案,里面是一枚纪念徽章,银色合金铸造,正面印有我的姓名和“从警三十周年纪念”“南通公安”字样、五山图案及日期。我瞬间心头一热,泪湿眼眶。这是组织颁发给我的,真是暖心,我算是老警了吧!这既是对我们以往从警生涯的充分肯定,也是殷切期望啊!它传达着组织的厚重关爱,让我们回望过往,珍惜使命荣光,坚定信心负重奋进创新绩!我想,或许不少和我一样领到纪念章的同志也会同感吧。

回家后,妻子未睡着。我把纪念章放在床边,她问:“立功奖章吗?”我答道:“差不多吧。有你的一半付出啊!”她看了笑笑说,“原来是纪念章啊,竟从警三十年了。”其实算上警校要33周年了,弹指一挥间就过了。

这枚纪念章,让我多次思考自身与公安事业。

我在想如何看待功绩。这是一枚纪念章,不是立功奖章,但在我眼里却类

同。立功奖章是颁发给一事或者一时突出贡献者的,这枚纪念章则是颁发给从警生涯较长的同志,给予肯定和激励,纪念章可能不似立功奖章让人钦羨,但它也代表着组织对受者忠诚与敬业的认可,同样有他的不平凡。工作虽要争先创优,获得组织褒奖赞誉,但无须过于图求片刻面上荣耀,仅需叩问内心,是否坚守初心,十年磨剑,为整个人生添彩。

我在回看成长路,看如何有幸入伍而从事着充满激情的事业、有幸运恩于组织培养而能较好适应于当前岗位,又想过往从警答卷是否令自己、组织和人民满意?是合格分还是优秀分?

警校时的青春依然清晰。刚穿上警服时的内务课听得那么认真,整理着装、宿舍内务整齐划一;每日迎着朝霞晨跑,从不间断;打靶第一枪两腿发抖而跑靶,经常瞄靶一站一节课,不久后便考核经常拿优秀;军体训练时场上摸爬滚打,衣裤全部磨坏,洗澡时双手酸疼疼不着背,最后擒拿格斗体能等考核优良;专业课本好多是学校自己印制的,学起来新鲜有趣,学摄影进暗室洗印照片,学交通管理围着汽车模型转了又转,实地驾驶时同学们相互切磋,在一片欢声中跑遍了当地山山水水。毕业了,同学不舍痛哭拥别,奔赴工作岗位。初入警是“小白”。到县城交警队后,

第一天是陈队长驾驶“边三轮”带我去车站等处巡查执勤,之后又带我经常在凌晨设卡盘查;是老万他们带着我烈日下站岗、雨天巡逻,每到一岗总是全力把交通维护有序;是蔡队长他们手把手教我事故处理,很快“单飞”熟悉了全流程业务。每天干劲满满,从无底气到信心渐足,让我充满憧憬。

从警日子是充实的。入了党,走上多个岗位,交警队、局机关,多个派出所、警种。每到新岗位,便学习业务、尽快适应。忘不了在政治处期间,我们夜以继日,大力宣传海门公安先进事迹,和同事们见证海门公安荣膺“全国优秀公安局”;在派出所期间,执行一次次处警办案、处置群体性事件、安保维稳,在维护一方平安中洒下汗水,数次遭遇凶险的场景历历在目;在机关警队,坚决执行上级意图、扎实履行本职,尽力当好枢纽发挥作用;我们牢记公安工作依靠人民服务人民要求,走向社会开展法治宣传、治安巡防,延伸公安触角,汇聚警民共治合力。工作期间,一个个创新目标让人振奋追赶,一项项团队成果让人豪气倍增,一件件英雄事迹又催人思齐。

过往岁月,伴随我的有成长、成绩,也有组织对我的肯定和充分关爱。能产生这些感受都因为事业可敬、工作有爱、团

队有情,是我与组织间的共振传递。

我有遗憾与不足,比如在基层所夜间值班时巡查不够曾经让一名当日亲手抓获的盗窃嫌疑人乘隙逃脱,幸亏不久又组织抓获,却大费周章;比如其他种种经验缺失或者能力不足导致的欠缺。

我经历过数位同事因公牺牲,他们的故事普通却又令人敬仰;我看到了优秀的同事走上领导岗位和领奖台,他们的故事激昂,让团队振奋自豪;许多的同事退休了、有的甚至不幸离世,他们的故事给后来者留下无尽怀念、共鸣。

我在审视当前,有没有被磨去棱角,消退激情;有没有成为井底之蛙、自我满足;有没有沉溺已有、裹足不前,应该是没有很好,只有更好。

我在思考今后,是否始终坚定理想大义、目标追求;是否做好充分准备、保持奋进动力;是否憧憬与坚信,时代伟业的建设队伍洪流中自己身在其中、享受喜悦。

逝去的是岁月,没有逝去的是情怀。纪念章,纪念的仅是过往和其中让人牵挂的情怀。这种情怀,对我们而言,是如何为人处世、在党为国、从警为民;这种情怀,也因岁月积淀得更厚重、真切、深沉。



杏坛有“恒” 老来“健”

□彭伟

一条约两米宽的水泥板块小径,两边是泥地操场。路畔场上,冒出些许青草,还有几个老式的篮球架子。循路往北,绿树耸立于两旁,中间是一处白色三角顶的大门,门中为圆拱形的过道,几位穿着白衬衫的老师,正推着自行车向南走来……

这是一帧旧照中如皋城南中学校园的景象。凝视照片,我的思绪沿着那个过道,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彼时,我在城南初中读过一个学期。校长是陈恒健,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他有位绝佳搭档汤瑞祥。两人一位教语文,一位教历史,撑起城南中学的高考补习班,名震一时。

我入校时,陈校长只从事行政工作,未听过他的大课。不过,日后他为我“开过小灶”。作为学生,我是“不务正业”的,整日忙着读些课外杂书。人家顶多一两门功课不好,好比瘸子,而我如同瘫痪,就没哪一门是灵的。补英语、数学的,大有人在,几乎无人补习语文。父亲是靠写评论文章改变命运的。秉承家学谈不上,但我因此对于文字有着别样的情感。我想补习语文。幸运的是,陈校长的一位胞妹是母亲的好友。恰巧他已调任电大任职,工作不再繁琐。他得以破例,收我做他的“入室弟子”——可以去他的“办公室、家中”学习。

陈校长的生活十分俭朴。每每,我穿过照片中那道拱门,一直走到底,右拐再到底,便到达他家楼下。他作为校长,分给自己的住房在高层。房子面积不大,家中只有几件家具。进入大门处,摆放着一张桌子。这既是他的书桌,也是餐桌,也成为我的临时书桌。补课的教材是陈校长旧时自用的备课参考教材《中学文言文助读》(杨振中著)。这本小册子录入多篇小古文。陈校长让我按序先自学,再给我逐句逐词讲解。文言文的精妙与难点集于一体:用词精练,一字多义。我的思维模式仿佛佛枝从生,想得过多,往往理解有误。陈校长因人而异,常常多举例,多考问,为我解惑。譬如,他解读《诸葛亮集·为将八弊》“贪而不厌”,引出“学而不厌”,两“厌”同义,“满足”。触类旁通,又有耐心讲解,陈校长的授课给我的印象真是“快乐”:乐于聆听,时间如飞,不知不觉就已到点。

我于陈校长,从贴近到尊敬,滥觞于一个小提问。有回,文中有个常见字,我忽然忘记意思,便匆忙请益。陈校长不假思索地轻声答道有四个义项,一一说来,最后又加重语气:“你可翻字典,再看下。”我便翻阅起手边的《现代汉语词典》,果不其然,词典中的解释如出一辙。我愧赧地低下头,悄悄地合上词典,心中满是敬意。“日拱一卒,功不唐捐。”陈校长早年从如皋师范毕业后,转战杏坛多载,坚持认真读书、备课,才能成为学生爱戴的老师。出于师生情,他将那册《中学文言文助读》赠我。

三十多年过后的今日,我和陈校长仍有联系。他退休后,迁居南通,身体健康。前不久,他还将自己的存书全部转赠予我,望我读读。翻阅陈校长的存书,尤其是那一册《中学文言文助读》,见到书中陈校长工整秀美的笔记,我总要鞭策自己像他那样:学海无涯,读书有常。



文化长廊 袁建摄

九月情思

□陈汉忠

又到九月,教师节如期而至。看到外孙在为老师制作节日贺卡,不由得把我的思绪也拉回到了离我已经远去的小学时光。

小学是人生的启蒙地,白纸般的知识屏幕上,小学给你抹上第一缕色彩。无论你是科学家、文学家、抑或别的名师大家,小学时代都是必需的,但也最易被忽视和忘却。时下有同学聚会,大抵大学同学居多,高中次之,初中已不多见,小学几乎没有。这可能年代久远,记忆缺失有关。我无意倡导小学同学组织聚会,但我觉得小学时光,是人生道路上最初的驿站,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视和怀念。

1962年,我七岁,父亲领着我到麒麟中心小学报名入学。那时入小学,既不查户口,也无须出示房产证之类的,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曹的教导主任。在他那间杂乱的办公室,他上下打量了我几眼,对我父亲说:个头还行。接着问我:几岁啦?我大声回答:老师,我今年七岁!老师笑了,点点头:还蛮灵光的嘛,数个数我听!我说:好!我是有备而来,之前姑妈早已教了我百以内的数数。我一口气背到30多。老师打断我的背数,说:行了,行了,就到顾老师班上吧!

我不知道谁是顾老师,但我见中心小学一排排宽敞明亮的教室,操场上还有跳跳板、秋千架和水泥乒乓球台,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好不容易盼到开学这天,父亲没把我领到镇西市的中心小学校园,而是把我送到了镇东北侧的陈家宅。那是什么学校呀,就一个班级,教室是陈家的一间堂屋,屋里放着七八张乡下人吃饭的方桌,六个人坐一桌,每个同学要自带凳子,40多个同学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西面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拼音写着欢迎新同学!

我的小学时代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学校经费严重不足,中心小学教室不够,又不能把适龄学生拒之门外,只好在附近租借老百姓家的空置房。教我们班的是两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一个叫顾亚珍,另一个叫黄欣芬。一年级时老师上课的

情景大多已忘记,只记得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两位老师总是一前一后,一人拎一个包,包里是孩子们的作业本。她们每天把收上来的作业本拿到办公室批改,第二天上课时发下来,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不知为什么,升到二年级时,我们的教室从镇东陈家宅搬到了镇西姚家宅。依旧是堂屋,一切都没变,只是换了地方。班主任是黄欣芬,我们班远离中心小学本部,课间也无玩的场地和设施,但老师上课却很出色,而且管理也很严格。记得有一回,我在午睡时间和同学交头接耳,被老师逮住了。下午放学后,我和另外俩同学被老师带到中心校的一间教室里,先训了一通话:无论听课,做作业或做别的什么事,都要专心致志,静得下心来,否则会一事无成。然后,老师在讲台上批改作业,我们几个趴在课桌上补睡一小时。这样“舒服”的处罚一般人肯定没经历过,而我却有幸经历,并且永远记住了。记住的还有老师语重心长的教导。在后来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每每学习工作精力不集中,或耐不住寂寞想要偷懒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次补睡和老师的话,提醒自己赶快做,千万不要分心。

如果说那次补睡处罚于我算意外所得的话,那后来一次甜蜜的奖励则让我受益终身。那年顾老师结婚,她爱人是部队的一名军官,婚礼在遥远的军营举行,原本教算术的黄老师代顾老师语文课时,要求全班同学给顾老师写一封信。为了鼓励大家认真写,黄老师宣布,挑一封写得最好的信寄给顾老师。也许是老师的激励撩拨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刚刚二年级的我,使出浑身解数,把课上老师提示的和课外书上读来的全用上了,一口气写了两页纸。信的内容现在大多忘记了,但信末的一句话记住了:“顾老师,我好想你,请你在回来的路上给我们带几块喜糖”。记得黄老师在批阅时,文中画了很多红线和红圈,还把信在班上宣读。

信是否真的寄给顾老师,我不得而知,但顾老师后来肯定读到了这封信,因为她回来后真的给我送了一包喜糖,

还摸着我的头说:信写得很通顺,很有情感,老师谢谢你!

正是这很平常的一次作业,两位老师在教上传神的配合,极大地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也许,正是这次甜蜜的奖励,为我日后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和热爱文学创作奠定了最早的基石。

从三年级开始,因家庭变故,我转学到了外婆家附近的长春小学,这是一所设施齐全的完小,附近几个村的孩子几乎全在这儿上学。年代久远,许多往事都淡忘了,但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名字一直铭记:施少凤、王能仁、王兴柏、沈士范、汪瑞菊、范美英、陆瑞娥、施允坤、王冠昌、姜锡康……他们熟悉的脸庞,亲切的笑容,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对了,还有王兴达校长,那年他从部队转业,安排到长春校任校长,他的卧室就在我们班教室后面的天井旁。他与我父亲很熟,大概想了解点学生的真实情况,报到后的一个周末,他让我陪他聊天,晚上住在他那。校长的感情与一个孩子的自尊产生了碰撞,想到贴身内衣上的破洞,我一再推辞,可还是拗不过他,硬着头皮住进了校长家。晚上,当他看到我露出膝盖的裤衩时,顿时明白了我一再推辞的原委。第二天,他把手从部队带回的长裤改短后塞到了我手里。

一位哲人说过,艰难的生活就像一块磨刀石,它每时每刻都在磨砺人的意志和毅力。童年时代家境贫穷的我,很少有新衣服穿,甚至没有过像样的书包。我还记得,因交不齐书杂费,老师不让进教室,逼迫退回家取钱。我知道家里都快断炊了,根本没有钱,于是在外面转一圈又回到学校,低着头站在教室门口。见状,老师明白了一切,默默地走到我身旁,拉着我把我送到座位上。那时我真想哭,但眼泪始终没有流下来。

岁月冲淡了往事,也给了我们新的馈赠。我在小学读了七年,老师们园丁般的辛勤耕耘,为我后来的中学、大学的学习和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我定居南京,但我却永远记着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此刻,我向远方的故乡道一声:老师,您好!



我的幼儿园时光

□梅九宏

差不多五十年前,我上的县城里的一所幼儿园。那时上幼儿园比较轻松,说是上学,其实也就是把大家集中起来一起玩玩,免得在家里待着无聊甚至惹是生非,基本上是唱唱童谣、背背儿歌、做做游戏,当时一无教材、二无作业,只有一张简易的课桌,凳子还是开学时家长从家里带过来,放假再背回去。

老师经常把喜欢的小朋友叫到她身边,搂在怀里说着悄悄话,比如那些长得漂亮、模样可爱的,或者家里条件好、穿戴整齐的,又或者乖巧听话、嘴甜会说好话的,还有老师亲朋好友的小孩等等常常会受到更多眷顾。当时感觉那个羡慕嫉妒恨呀,无数次幻想着自己也能躺在老师怀里,让她“惯”一下,而上述条件我一个也不具备,注定只能是“洗洗睡吧,梦里啥都有”。不过,老师曾经有一次安排我去领粉笔,为此我激动了好几天,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成了同学眼里的小“红人”。

幼儿园的厕所就在教室隔壁,不分男女、敞门入内。邻居大妈也常常跑到幼儿园上厕所,她坐在老式的茅坑上,与老师边聊天边上厕所。那时的我们也傻乎乎地在旁边待着,听她们天南海北地扯着张家李家长短,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雅或者违和感。

幼儿园既不要补课,也不要弹钢琴、学英语,总体无忧无虑,但是也有心烦的时候,尤其是在炎热夏季,下午上课前老师要求先集中午睡一个小时。说是午睡,就是趴在桌上眯会儿,我趴在课桌上根本睡不着,偶尔睡过一次,手都压麻了,还流了一摊口水。如果坐立不安,不好好睡的话,要被老师批评,甚至罚站,日复一日,每日如此,我可吃不消。于是,在夏天我总让外婆推迟一小时,也就是其他小朋友刚睡醒的档口,护送我到幼儿园,并且向老师信誓旦旦地证明我家已经午睡过,绝不是在家里玩的,这样老师才允许我进教室。

那时候我好像非常胆小,幼儿园后面是一个小树林,里面有片墓地,有小朋友说那里晚上经常有亮光,那就是“鬼火”。吓得我不敢从那里经过,生怕被鬼怪缠上。还有一个小朋友说长江里有几条鳄鱼溜出来了,有可能从我们的下水道里冒出来,吓得我每次蹲在厕所里都提心吊胆,生怕鳄鱼突然窜出来咬我屁股。同时,大人们担心我们放学后到处瞎跑,干脆说是遇到外地口音的陌生人,千万不能跟他搭讪,不能被糖果等诱惑,一接触就会晕倒,被他抢走拐卖,所以我们小小学纪警惕性挺高,我可不想被拐卖到山区。

幼儿园只分小班和大班两个年级,就这样,平平安安、轻轻松松玩了两年,就直接上了小学,幼儿园的同学基本不记得了。不像现在,还会拍个毕业照,搞个毕业聚会等,但这些童年趣事却像老电影一样,一幕幕常常闪现脑海中,生动而有趣。

43年前的今天

□扬子鳄

今天是2023年9月3日。43年前的今天,是1980年9月3日。这是我第一个自始就能记得准确日子的一天。是我人生中特别的一天。

那一天,我动身去上大学。还记得南通港码头上母亲、弟弟、妹妹送别的泪眼,二舅舅人群中挥别的手臂……

而父亲,则送我去上海,去火车站,然后我一个人去成都。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火车站。在上海火车站门前广场,我们放下行李,其中肯定有一只二舅舅送我的皮箱,这皮箱一直跟着我,直到今天。皮箱里主要装着我的衣服,可能还有书籍。另外应该还有棉襖之类的包袱。我现在发现,我的记忆力其实不好,许多事都记不清楚,只能想起一些关键。

记不得是父亲还是我自己去窗口买来当天晚上去成都的火车票,只记得买票很顺利。现在回头想想,当时又没有预售,或者说是我们不知道、没办法预购,如果到了火车站广场而最近几天的票都没有,我们该怎么办?

在广场的暮色中,等待着发车。南通港到上海的客轮是上午10点出发,途中约6小时,下午4点左右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然后我们赶到上海火车站。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乘过火车,去过朝鲜,虽然长期生活在农村,但毕竟有点经验,有点见识。我当时17岁8个月18天,现在看来还完全是个孩子,就跟着父亲走。也记不得换了几次公交车,父亲肯定是问了许多次人,才赶到了火车站。(大概十年前,我又一次去上海火车站,注意看了一下,依稀有着记忆中的影子,但又感觉不太像)

等待中,父亲与周围候车的旅客攀谈,得知有几个人是平潮的,应该算是很近的老乡了,他们去攀枝花工作,途经成都,和我是同一趟车。父亲虽然没有太多流露,或者是我当时没有留心观察,但内心肯定为第一次出门的我担心。他此时很高兴,请他们照顾我。那几人很热情,让父亲放心。

事实上,那几人照顾了我,从上车放行李(怎么正好还坐一起?是当时火车票不规定车厢、座位吗?)到途中吃饭啥的,都有提醒、帮助。好像到成都下车时,他们还帮我提过东西。而他们应该是从成都再转车继续南行去攀枝花。

这几位也应该算是我的恩人。虽未再见,但铭刻于心。父亲虽然把我拜托给了他们,但仍然吩咐我时时当心。后来他才说,他也怕对方是坏人。直至收到我从学校寄回的平安家书,父母亲才放心。

在广场上告别前,我拿出一张10元钱(当时的最大面额)给父亲,让他回程时手头宽裕一点。当时为了我去上学,家里的钱都凑给了我,有一二百元,家里还拉了会或者是与人商量后收了会。在我的大学同学中,我的家庭条件、受教育条件应该是最差的。新生开学晚会上,主持人让外系一名女生钢琴独奏《致爱丽丝》,我啥都没听说过。父亲后来说,亏得我这10元钱,他才能买了船票回家。那一夜,他没钱住宿,在十六铺码头晃荡了一宿。

大概夜里9点多钟,我得上车了。走进检票口,我回头最后望了父亲一眼。那一眼,我一直记得。是感激、是担心、是无助……眼神似乎很单纯,又似乎很复杂。

43年前的今天,历历在目。43年后,我有了两个儿子。一个33周岁,一个23周岁。一个在地球的另一面,一个在眼前。可是,我欲像当年父亲送子求学那样辛苦而又不得……

